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分科本◎经济

纪念版

蜜蜂的寓言

第二卷

〔荷兰〕B. 曼德维尔 著



SINCE 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

纪念版

蜜蜂的寓言

或私人的恶德，公众的利益

第二卷

〔荷兰〕B. 曼德维尔 著

肖聿译



商務印書館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蜜蜂的寓言:或私人的恶德,公众的利益/(荷)B.曼德维尔著;肖聿译.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7
(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·120年纪念版·分科本·经济学)
ISBN 978 - 7 - 100 - 13475 - 0

I. ①蜜… II. ①B… ②肖… III. ①自由主义(经济学)
IV. ①F091. 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88874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(120年纪念版·分科本)
蜜蜂的寓言
或私人的恶德,公众的利益
(全两卷)
〔荷兰〕B.曼德维尔 著
肖 聿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ISBN 978 - 7 - 100 - 13475 - 0

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×1240 1/32
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23 1/2
定价:90.00 元

蜜蜂的寓言^①

第二卷

本书第一卷作者著

Opinionum enim Commenta delet dies; Natura Judicia confirmat.

Cicero de Nat. Deor. Lib. 2

时间摧毁了人们毫无根据的妄念，确证了基于现实的判断。

—— 西塞罗：《论神性》(*De Natura Deorum*)卷二

① 本页为 1729 年版《蜜蜂的寓言》扉页文字。《蜜蜂的寓言》共分两卷，1732 年版是曼德维尔生前出版的最后版本。牛津克莱伦登 1924 年版第一卷即依据 1732 年版本刊行。另据 1924 年版本编选者凯依(F. B. Kaye)考证，1729 年版本的第二卷更接近曼德维尔本人的文本。因此，牛津克莱伦登 1924 年版第二卷依据 1729 年版本刊行。——译者



目 录

(第二卷)

前 言.....	1
一 霍拉修、克列奥门尼斯与芙尔薇娅的第一篇对话.....	24
二 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的第二篇对话	57
三 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的第三篇对话	96
四 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的第四篇对话.....	142
五 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的第五篇对话.....	186
六 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的第六篇对话.....	253
索引.....	342

前　　言

对《蜜蜂的寓言》的不以为然，掀起了各式各样的喧嚣，即使我发表了为该书的《辩护》^①之后，也是如此。因此，见我未进一步理会对此书第一卷的批判，便发表了此书的第二卷，我的很多读者会感到惊讶。无论发表了什么，都被交给了全体读者的判断力，我认为这理所当然；但认为作者不会遭到他们出于同样理由的批判，却也毫无道理。我受到的对待和一些先生对我的冒犯，已众所周知，因此公众一定在此前便深信：在礼貌方面，我并不欠我那些对手什么。若说那些擅自到学校里申斥我的人享有不容置疑的权利，谴责他们认为该谴责之事，而无须征得我的同意，随意对我说三道四，那么，我也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，检查他们的谴责，并轮到我来做出判断，而不征询他们，无论他们是否作答。公众一定是我们双方的仲裁。此书第一卷第三版之后的“附录”可以表明：我从未拼命阻止那些反对我的意见或谩骂，也未对读者隐瞒它们。我本想利用出版此书第二卷之机，为读者提供一份名单，写上那些撰文反对我的人，但由于此辈除了人多便不值一提，我便担心此举会被视为卖弄，除非我回答他们每一个人，而我从未打算如此。我一直保持沉默，因为我迄今未遭到任何说我有罪或不道德的控告。每个

^① 《辩护》(Vindication)，全名《为本书辩护》(The Vindication of The Book)。见本书第一卷。——译者

能力中常之人，都无法圆满地回答根据此书某一部分（无论是其《辩护》还是正文）罗织的指控。

iii 但我还是用了将近两年时间，为《蜜蜂的寓言》写了一篇辩护。我在其中公布了对此书的或许有理的全部异议，并尽量回答了它们，例如此书提出的学说，以及该学说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的伤害。这是因为我只关心此事。我知道，我写此书绝无歹意，因此，我应对此书遭到非难感到遗憾。但无论此书写得是好是坏，其思想都不值得我关心。因此我要说：我欢迎批评者畅所欲言，他们从我的不良论证中挑错，说此书写得很差、毫无新意、其材料前后不一、其语言粗野、其幽默粗俗、其文风低劣得可怜。我认为他们大体上是对的，但即使他们错了，我也绝不会费心去反驳他们，因为我认为：作者为自己的能力辩护，乃是最大的蠢举。我写此书意在消遣，因此我达到了目的。读者若未从此书获得快乐，我深感遗憾，尽管我认为自己不该对读者的失望负责。此书并非应约之作，我也从未在任何地方担保此书有用或有益；相反，在此书的序言里，我已将iv 它称作“微不足道的东西”，此后我也公开承认它是一首狂想曲（Rhapsody）。人们购书却不浏览其内容，或不知它们讲什么，若那些书与其期望不符，那么，我便不知除了购书者自己还该怪谁。再说，人们购书后不喜欢它们，也绝非鲜见：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哪怕大人物事前最坚决地断言某书一定会使读者愉快。

我的几位朋友看到了我提到的那篇辩护的绝大部分。一段时间以来，他们一直盼着我发表它。我迄今未出版它，既非因为铅字排版，亦非因为纸张，而是另有原因。请允许我实话实说：那些原因与任何人的钱毫无关系，也绝不会与赚钱有关。无论那篇辩护

何时出版,我的很多对手都会认为它出版得够快,除了我,谁都不会因其拖延出版而受损。

自从此书第一次遭到批评,有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使我感到惊愕和困惑:人们认为我写此书意在使英国堕落、提倡一切恶德,这究竟是为什么?很久之后,我才弄清了自己罪名的由来,那就是欲加之罪和恶意蓄谋。人们能从《乞丐的歌剧》^①的频繁演出中,认识到流氓和强盗增多的问题十分严重^②。从我知道了这一现象,便相信了一点:世上果真有这样的固执己见者,一见到揭露恶德,便以为是在助长它们。对此书的批判,还起因于一种同样的误解:我的一些敌人对我非常恼火,因为我在《辩护》一文中承认,我迄今仍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,克服自己的虚荣心(Vanity)。他们的谴责表明:他们一定以为控诉某种人性弱点就等于宣扬它。但若这些恼火的先生不是如此为激情所蒙蔽,或是眼睛更亮一些,便很容易看到(除非他们过于以骄傲为荣):他们只要真诚,便会承认自己也有虚荣心。以自己的虚荣心为荣且傲慢自大者,全都不可原谅。但是,当我们听见一个人抱怨某个缺点,并说自己无力克服它,却丝毫没有表现出那种缺点(我们本来有理由为那种缺点责备



^① 《乞丐的歌剧》(*Beggar's Opera*),英国的三幕通俗歌剧,1728年1月29日首演,剧本为英国诗人、戏剧家约翰·盖伊(John Gay,1685—1732)所作,音乐为德裔英国作曲家约翰·佩普施(Johann Christoph Pepusch,1667—1752)所作。此剧讽刺了政治、贫困、法律不公、社会各阶层的腐败,剧中人包括警长、巡官、狱卒、强盗头、小偷、戏子、妓女、荡妇等平民角色,音乐十分通俗,大受欢迎,连演了62场。——译者

^② 英国伦敦的治安官约翰·菲尔丁(Sir John Fielding,1721—1780)曾说:“该剧首演并连演多场之后,有相当多的拦路强盗被捕……”见威廉·库克(William Cook)著《查尔斯·麦克林回忆录》(*Memoirs of Charles Macklin*)1804年版,第64页。查尔斯·麦克林(Charles Macklin,1699—1797)是爱尔兰演员、戏剧家。——译者

他),我们却绝不会认为自己被冒犯,反而会喜欢此人的聪明,为他的坦率喝彩。这样一位作者对读者的冒犯若除了通常的写作方式,别无他过,并承认其作品来自虚荣心(而其他人都在这一点上撒一千个谎),那么,他的自白便堪称嘉许,其坦诚只应被看作对公众的尊重,被看作他的谦逊,而他并不是非如此不可。错误并不在于产生种种激情,并不在于具备人性的种种弱点,而在于沉溺并服从那些激情和弱点的命令,却对抗理性的指示。十分尊重其读者的人,无不谦恭地将自己交给读者的判断力,同时又告诉读者他全无骄傲之心。但我要说:这样做的人全都不会受到称赞,因为这无异于自吹自擂,且不必付出任何代价。经验丰富者和最敏锐者,即使几乎未见到一个人的谦逊,也会坚信此人心中绝无骄傲。见不到谦逊,会使人以为骄傲已不存在。谦逊之美德,起码并不比阉人(Eunuch)的贞洁(Chastity)更伟大,并不比乞丐的谦卑(Humility)更伟大。老加图拒绝了递给他的水,若人们不认为他当时正焦渴难耐^①,此事还会被后人铭记么?

读者会发现,我在本书第二卷中尽力说明和解释了一些事情,它们在第一卷中说得比较模糊,只是做了暗示。

我构思此卷时发现:对我而言,最便利的表达方式乃是对话(Dialogue),但是,讨论观点和设置争论,却被视为最不公平的写作方式。心怀偏见者都很想以很少的代价摧毁对手,战而胜之。

^① 参见本书第一卷对长诗《抱怨的蜂巢》的评论〔O〕:“那位伟人在利比亚的灼热沙漠上徒步行军时,焦渴难耐,却拒绝了递给他的水,等他的全体士兵都喝过水后他才喝。”加图(Cato,公元前234—前149),古罗马贵族政治家,曾任共和国检察官,因反对恺撒的阴谋败露而自杀,史称“老加图”。——译者

用对话打击对手，乃是长期频用之法。在这样的对话中，自双方交战之初，主角（他终将败北）就似乎是受害者，或者说，他会被作为牺牲品（sacrificed），比圣灰节^①的公鸡几乎强不了多少，屡遭打击，根本无力还手，分明是为了被打败而故意设置的。以此反对写作对话，当然很正确^②，但同样正确的是：舍此没有其他任何写作样式能为作者赢得更大声誉。纵观古代，在对话写作方面，有两位出类拔萃的著名作家——柏拉图（Plato）和西塞罗（Cicero）：前者的哲学著作几乎全是对话；后除了对话未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。因此，写不好对话的人，显然错在对话使用不当，而在写作样式，而对话使用不当，则最能败坏对话的名声。柏拉图说，他在一切写作样式中首选了对话，是因为在对话中，事物仿佛正在发生，而不是正被讲述。其后的西塞罗也以自己的语言，表达了同样的意思^③。其实，反对使用对话的最有力意见是：写好对话很难。柏拉图《对

^① 圣灰节(Shrove-Tuesday, 又名 Pancake Day)，基督教四旬斋(Lent)开始的前一日，通常在一年中的二月或三月，人们吃烤薄饼和丰富的食物，以准备度过其后的 40 个斋戒日，直到复活节(Easter)。英国的圣灰节还举行传统的“砸雄鸡”(Cock throwing)活动，直到 18 世纪末期：将一只雄鸡绑在柱子上，人们轮流向它投掷木棍，直到将鸡砸死。它曾是英国所有阶层的一项娱乐，但由于人们价值观的转变(即逐渐关心动物的福利)，此项活动慢慢减少，终于于 19 世纪初消失。——译者

^② 英国哲学家沙夫茨伯里(Anthony Ashley Cooper, 3rd Earl of Shaftesbury, 1671—1713)说：“他[哲学家]若借对话中的任何人物阐述其哲学，在辩论中取胜，将全部智慧用于战胜世人的智慧，便会显得是在开玩笑。”见他的《性格论》(Characteristics, 1711)卷二第 7 章。——译者

^③ 柏拉图和西塞罗都不曾说过此话。有人认为，曼德维尔或许想到了柏拉图在其对话录《提阿底忒斯》(Theaetetus)里说过类似的话，其中的尤克利德斯(Eucleides)说：“我写对话的方法是：我笔下的苏格拉底并不与我交谈，而是正如他所说，在与(他告诉我的)其他人对话。他告诉我，他们是几何学家提奥多罗斯(Theodorus)和提阿底忒斯(Theaetetus)。”(见该篇第 143 节之 a 和 b)；西塞罗在其论著《论友谊》(De Amicitia, 写于公元前 44 年)里重复了它。——译者

viii 话录》中的主角始终是其导师苏格拉底(Socrates)。苏格拉底处处都保持着其人格的高度尊严;但柏拉图若不像苏格拉底一样伟大,便不可能让一位如此非凡的人物像柏拉图那样,就那么多关键问题发表意见。

西塞罗除了模仿柏拉图,不事任何研究。在其对话中,他引进了当时罗马的一些最有名的人物(他们各持己见),让他们表达各自的观点并为之辩护,尽力使语言生动活泼,如同他们本人在说话。阅读他的对话,你很容易想象出他本人:他与各种饱学之士相伴,那些人趣味不同,学问各异。但若欲如此,你就必须具备西塞罗的才能。同样,琉善^①和另一些古代作家,也都选出了其对话中各自的代言人和性格鲜明的对话者。不可否认,这比一些陌生的姓名使读者更感兴趣、更加关注。但有一点也很明显:若找不到想要的对话者,作者便亲自出马,去完成他本来无力完成的任务。为避免这种麻烦,对话的写作者大多利用化名的同代人,那些人物或是作者本人的杜撰,或借自他处。一般地说,那些人物均为巧妙的 ix 合成体,取自希腊,旨在弥补对话所需人物的短缺。作者指定他们代表与作者相同的一派,或代表为作者所爱或所恨的一方。不过,所有这些适用的合成人物中,没有一个像斐拉列忒斯^②那样,其魅

① 琉善(Lucian of Samosata,约 125—约 192),希腊讽刺作家,其《众神的对话》(*Dialogi Deorum*)和《死者的对话》(*Dialogi Mortuorum*)讽刺了希腊的哲学和神话。——译者

② 斐拉列忒斯(Philalethes),全名 Eirenaeus Philalethes (意为“平静地热爱真理的人”),17 世纪英国炼金术士,著有多种有影响的著作,其读者包括牛顿、洛克和莱布尼茨。这是一个笔名(*nom de plume*),其真实身份一直无人知晓。2002 年和 2003 年,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两本传记证明此人是英国的炼金术士乔治·斯达奇(George Starkey),他 1628 年生于百慕大群岛,1665 年死于伦敦大鼠疫。——译者

力能与众多不同观点、不同才具的作者相当^①。这清楚地表明：人类通常都万分尊重真实。两百年来，尚无一场重要的纸上大战^②，其中两派没有在不同场合利用过这位常胜的战士。迄今，无论他为哪一方作战，都像德莱顿^③戏剧中的阿曼佐尔^④一样，都是胜利者，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但是，此法要求进攻前公布那些战士的名字和战事，因此，由于并非每个人都能使自己保持平静，很多读者便抱怨道：他们花了钱，却得不到足够的娱乐，而事先知道如此，更破坏了他们的全部娱乐。这种情绪曾流行一时，作者们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为其对话中的人物取名。我认为，这种粗略之举也像我采取过的其他做法一样合理。我给我《对话》中的交谈者取的名字，别无他意，只是为了区分他们，丝毫不曾考虑那些名字的出处，不曾想过其任何涉及辞源学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对那些名字，我唯一关心的是：其发音不应刺耳，听上去不应令人厌恶。

虽然我给《对话》中的人物取的名字是虚构的，其环境也是虚构的，但那些人物本身却是真实的；我尽量忠实地复制了现实人物。我知道，一些批评家挑剔作家的毛病，说他们给剧中人的名字附加了简短的性格提示，断言此举妨碍了他们的快乐，而无论演员



^① 在曼德维尔时代，斐拉列忒斯尚被视为虚构人物，作者们将他用作自己观点的代言人，以战胜论敌。——译者

^② 纸上大战(Paper-War)，指文字论争。——译者

^③ 德莱顿(John Dryden, 1631—1700)，英国作家、桂冠诗人。——译者

^④ 阿曼佐尔(Almanzor)，德莱顿的悲剧《攻占格拉纳达》(*The Conquest of Granada*)中的英雄。该剧首演于1670年，讲述了摩尔人击败西班牙人、攻陷格拉纳达城的故事。阿曼佐尔为摩尔人作战，最终发现自己竟是西班牙阿尔考斯大公(Duke of Arcos)之子，却仍为摩尔人作战。——译者

扮演谁，观众都绝不需要提示者(Monitor)，都认为自己聪明得足以懂得角色性格。但我绝不赞成这种责难。我认为，知道一个人与何种人为伍，乃是一种满足。我与人们交谈了一段时间后，便很希望深入地了解他们，越早越好。正因如此，我认为应向读者介绍我的几篇《对话》中的人物，他们将使读者愉悦。他们都已被设定为上流人士(People of Quality)，因此在具体讲述之前，我要请读者原谅，因为我将谈及一些与一般上流社会(Beau Monde)有关的事情，虽说很多人都可能知道它们，但并非人人都注意它们。各个基督教国家的上流社会里都有这样的人：他们虽然正义地痛恨无神论，痛恨公然地反对宗教，但其宗教信仰却依然很少，而若考察他们的生活与观点，便会发现他们都是罕见的半信徒(Half-Believers)。优良教育的首要目的，是尽可能多地获得人世间的安逸和快乐。因此，人们首先学会了各种技巧，以使自己的行为既为他人所悦纳，同时又最少扰乱自己。其次，人们深入了解一切文雅的生活舒适，了解人类智慧提供的避免痛苦和麻烦的教训，以尽量在人世间享受，尽量将障碍减到最少。同时，这种人也研究各自感兴趣的事情，互相帮助，促进或增加一般的生活之乐。经验告诉他们：欲达到那些目的，应绝口不谈使他人不自在的事情(哪怕稍微带有此种倾向的话题，也不可谈)。无论是谁，都不应责备他人的过错、缺点或疏忽，或提醒他人想到自己的责任，尤其不该当众批评，除非你是父母、学校教师或家庭教师。责备他人、声言教训他人，均属恶劣之举，因为我们根本无权如此，哪怕走下布道坛的神甫，也无权如此。神甫若想被看作有教养的传教者，便绝不该盛气凌人地说话，绝不该提到令人沮丧消沉之事。但我们无论在教堂听到

什么言论，当我们走出教堂，进入了上流社会，无论出于什么理由，都不可提及它们，无论是未来状态之必然，还是悔过之必要，抑或一切涉及基督教本质之事，均不可提及。这个话题并不有趣。何况，想必人人都知道那些事情，因此也都当心它们；不仅如此，除此之外的想法还被视为粗鲁无礼。上流社会流行的“恰如其分”（Decency）^①的规则，即便不是一切上流社会人士必须遵守的唯一规则，起码也是首要规则。遵照这个规则，不少上流社会人士都去教堂领圣餐（Sacrament）。这个规则还迫使他们彼此拜访，经常组织娱乐。上流社会最重视的，乃是受人欢迎和表现出良好教养，因此，其中大多数人都格外重视一件事（其中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）：不可表现出时尚允许之外的宗教虔诚，因为他们担心被看作伪君子或盲目信教者。

但“美德”（Virtue）一词却十分时髦，一些最奢侈的人极喜欢它悦耳的声音，尽管他们口中的“美德”毫无意义，只表示对一切有尊严的崇高事物的极度尊重。他们对一切粗俗的、不得体的事物深恶痛绝。他们似乎以为，“美德”首先是恪守礼节规则，恪守一切荣誉法则，只要它们涉及他们理当得到的尊重。如此众多的华丽辞藻宣扬的，正是必须实践这种美德；而众多的战士也随时准备拿起武器，以使美德永存。笃信美德者，并不放弃自己的任何快乐。他们能公开地或秘密地享受时尚。他们做不到为热爱真正的美德而牺牲心爱之事，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满足于弃绝外在的、畸形的

^① 恰如其分（Decency），此字源于拉丁语的“Decorum”，指适度得体，妥帖自然。朱光潜先生在《西方美学史》（上卷，第105页）中将此字译为“合式”。又见本书第一卷对长诗《抱怨的蜂巢》的评论[Y]。——译者

恶德,使自己显得教养良好。虐待自己,或大谈“美德要求克己(Self-denial)”,都是荒唐可笑的。宫廷哲学家(Court-Philosophers)无不认为:一切使人禁欲或令人不自在之事都不可爱,都不是人们想要的。女子的文雅风度和不令人讨厌的言行,皆为贞洁(Chastity),也是上流社会对男人的要求。无论一个男人私下让自己如何自由,其名誉都不会受损。他隐瞒对某些事物的热爱,不会粗野地探求它们,尽力不让自己蒙上任何恶名。*Si non castè saltem cautè*^①,这条规则足以表明人人之所愿。无节制(Incontinence)虽被视为罪过,却从不曾有人因此得咎,而30岁以下的男人大多都不愿节制自己,即使现代女子也是如此。

世人无不为了恭维自己,而渴望被看作具备真正的美德;因此,赤裸裸的恶行,以及一切能被他人看见的违法逾规之举,都是可憎的、不可宽恕的。白天在大街上或任何严肃集会上见到醉醺醺的人,都会令人震惊,因为这种醉鬼违反了正派规则(Laws of Decency),分明是缺少尊重和不负责任,而人人都理应尊重公众、对公众负责。同样,穷人也会受到责难,说他们将时间或金钱用于喝酒,而他们本来承担不起那种开销。但即使没有这些责难和一切世俗顾忌,酗酒本身作为一种罪恶,一种对上天的冒犯,也很少遭到责难。任何富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:他在某个时候正与酒友为伴,一起痛饮。只要酒后不犯任何罪过,既无残忍行为,亦无奢侈挥霍,为喝酒而聚在一起的人便乐于将喝酒视为清白无辜地

^① *Si non castè saltem cautè*, (拉丁语) 谨慎无大错, 可直译为“至少不应惩罚谨慎”。——译者

打发时间，尽管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们都将 24 小时中的五六个小时用于喝酒。一切从不过量饮酒者，都不曾获得良俦之美名。倘若一个人人格足够强壮或足够谨慎，以致虽然彻夜饮酒，次日却毫不失态，那么，人们便至多会说他“嗜酒有度”，尽管他夜夜以喝酒为消遣，几乎从未完全清醒地上床睡觉。

诚然，贪婪(Avarice)通常都遭人憎恶，但人们的贪婪既表现为艰辛弄钱，亦表现为存钱聚财，因此，获取财富的一切卑鄙、肮脏、荒唐的手段，都应被谴责、被戳穿。也应谴责和戳穿积攒钱财的各种卑劣、可鄙、吝啬的方式。但世人更宽容贪婪。一个人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，过着十分光鲜体面的生活，尽管他总是提高其房产的租金，而在他的统治下，房客几乎无法生活；尽管他依靠高利贷致富，依靠利用一切野蛮的优势、盘剥别人的生活亟需致富；尽管他本人经常拖欠薪水，也是那些不幸者的无情债主，这种人全都不会因贪婪而受谴责。同样，自己尽情享乐，并允许家人在他能负担的条件下都生活得时髦，这种人也全都不会被视为贪婪。家产非常丰厚者，却无端地热望更多财富，这种人是何等常见！一些人要求增加其职务津贴时，是何等贪心！那些能获利之处，造成了多少不光彩的卑躬屈膝！没有养老金(Pension)便无法生活的人，为获得养老金，对幸运儿们的照料是那么奴颜婢膝、俯首低眉，其阿谀奉承是那么全无男子气概！不过，人们根本不会谴责这些事情，除了敌人，除了嫉妒者，或许还要除了心怀不满者和穷人，谁都不会责难这些表现。相反，很多家境良好者虽然养尊处优，却大夸自己的勤奋和进取，说自己抓住了重大的机会，说自己为了家人勤勤恳恳，说自己懂得如何活在世上、适于活在世上。

xv

11

xvi

但是,他们这些解释对基督教实践的危害,并不亚于人类的自大对基督教信仰的危害。巧妙的教育教会了人们无比看重人类自己,而若不能正确地利用这种观念,它便会危害基督教信仰。众所周知,人类自认为比其他所有动物都优越得多,其理由就是人类具备理性机能,这完全是事实;但我们越是惯于崇拜自己,我们便越是骄傲,越是看重我们的理性能力,这也是事实。这是因为,经验告诉我们,人对其自身价值的尊重越多、越不寻常,受到伤害时往往就越会心生怨愤。同理,我们也看到:人对自身优点看得越高,就越远离其推理机能,越不愿赞成一切似乎侮辱了理性机能,或与之作对的观点。若让一个人承认他不理解任何事物,这位高傲的推理者便会将这唤作对人类理解力的公然侮辱。安逸和快乐是上流社会的重要目标,礼貌与上流社会的行为密不可分,因此,上流社会人士无论信教与否,都绝不会反对宗教,因为他们在宗教中

12

xvii 长大。他们随时准备循规蹈矩,参加每一个敬拜上帝的仪式,他们一直习惯如此,从不和你争论,无论是争论《旧约》还是《新约》。若轮到你做决定,你便不会重视宗教信仰和宗教真理,而允许人们将创世的历史和一切无法理解,或无法以自然的理由解释的事物,看作寓言或隐喻。

我绝不相信,所有基督教国家的上流社会人士中,都不存在比我这里描述的更恪守美德、更虔信宗教的人;但我要请每一位有见地的、公正的读者相信:相当多的人都酷似我描绘的那幅图画。我在本卷《对话》中引进的交谈者名叫霍拉修(Horatio)、克列奥门尼斯(Cleomenes)和芙尔薇娅(Fulvia)。霍拉修代表我一直谈论的上流人士,更准确地说,代表其中道德较好的人士,尽管在一切从